

# 增强抗日战争史教学的历史科学性

——以清华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慕课为例

翁贺凯<sup>a,b</sup> 李瓊珞<sup>b</sup>

(清华大学 a. 高校德育研究中心 b.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084)

[摘要] 习近平在《致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中所提出的“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是高屋建瓴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学说精髓的一个深刻论断。抗日战争作为中国近现代史的大事,其历史的书写和教学关乎到青年一代唯物史观的形成、爱国主义精神的塑造和理想信念的坚定。为此,应当在牢牢把握思想政治性的大方向的前提下,努力增强抗日战争史教学的历史科学性,以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和说服力。清华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慕课在这方面作出了有益的尝试,实现了历史科学性与思想政治性的统一。

[关键词] 抗日战争史 教学 历史科学性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慕课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707(2018)6-0080-05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近代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是中国抵抗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民族性的全面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亚洲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东方主战场。抗日战争史的教学研究是国内学术界与教育界长期关注的重点和热点问题。因应“互联网+”时代教育媒介发展的新趋势,如何在牢牢把握思想政治性的大方向的前提下努力增强抗日战争史教学的历史科学性,成为值得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重新审视的问题。对此,本文拟以清华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慕课的教学实践为例,略陈己见。

## 一、“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

习近平一贯重视历史学习和研究,并有大量丰富而深刻的论述。2013年6月25日,习近平在主持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

必须修好。”<sup>[1]</sup>知史可以通今、鉴今,只有了解了中国近现代史,才能了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进一步凝聚力量、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习近平还从整体社会科学的视域来阐释历史研究的重要性。2015年8月23日,他在《致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中开宗明义指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sup>[2]</sup>这是共和国历任的最高领导人之中首次明确地指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这样一个重要的论断,笔者认为这也是一个具有深厚马克思主义学理支撑的重要论断。

马克思恩格斯在其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有这样一段非常经典的论述:“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制约……”<sup>[3]</sup>马克思逝世之后,恩格斯评价说:“(马克思的逝世)对于欧美战斗着的无产阶级,对于历史科学,都是不可估量

本文为教育部在线教育研究中心课题“基于慕课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混合式教学模式创新研究”(项目编号 2017YBI41)阶段成果

的损失。”<sup>[3]76</sup>显然,“历史科学”是马克思学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整体性的范畴。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在马克思学说中最高的一元性的范畴是历史,我们所要回到的整体的马克思就是回到马克思的历史科学。”<sup>[4]</sup>

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所用的“历史科学”(德文原文即“Wissenschaft der Geschichte”)的含义,学界素有争论,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在不同语境脉络下的论述亦不尽统一。北京师范大学沈湘平教授认为,“历史科学”主要含义有二:一是学科划分意义上的历史科学,二是作为统一科学研究话语、方法和原则意义上的历史科学;后者的重要规定性有:历史主义或历史性的原则、实践的诠释学的原则、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人学或人道主义的方法。<sup>[5]</sup>南开大学王南湜教授认为:不应忽略“唯一的”“历史科学”的提法之中所包含的对于准确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革命性的重大意义,既不能把“历史科学”降格为一般的实证科学,因为马克思的历史科学观念从根本上区别于经验主义的科学观念就在于他公开承认历史科学研究有一个一般性的指导原则,但是更关键的是,不能把“历史科学”简单地“拔高”为一种思辨的历史哲学,对于历史唯物主义或历史科学而言,最重要的是在一般原理的指导下进行具体的历史研究,而不是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批评的那样,将一般原理作为可以到处套用的现成公式,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上述两种错误倾向都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特征的一种曲解。王南湜教授认为,历史科学、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自觉的以一种经过批判性反思的一般性方法原理为范导的实证性或经验性科学”,亦可称之为“批判的历史科学”。<sup>[6]</sup>

无论“历史科学”的内涵究竟何指,我们很难否认的是:历史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正如有的论者所言:“历史主义或历史性是由马克思的科学世界观产生出来的基本原则,它是历史科学的直接规定性。”<sup>[4]</sup>以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成公式剪裁历史、解释历史,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义。如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就说:“在历史科学中,专靠一些公式是办不了什么的。”<sup>[3]163</sup>相反地,我们必须对历史科学研究真正的重要性与困难性有充分地认识,如马

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言:“只是在人们着手考察和整理资料——不管是有关过去的还是有关当代的资料——的时候,在实际阐述资料的时候,困难才开始出现。这些困难的排除受到种种前提的制约,这些前提在这里是根本不可能提供出来的,而只能从对每个时代的个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和活动的研究中产生。”<sup>[3]74</sup>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习近平在《致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中所提出的“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是站在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制高点上、深刻地高屋建瓴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学说精髓的一个论断。

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走向未来的基础。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警惕历史虚无主义。抗日战争史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材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篇幅。抗日战争史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其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时代主题密不可分。它不仅仅关乎历史史实的研究,而且关乎青年的爱国主义教育、理想信念教育。根据前文对“历史科学”内涵重要性的剖析与揭示,笔者认为,应当在牢牢把握思想政治性的大方向的前提下,努力增强抗日战争史教学的历史科学性。下文笔者将结合清华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慕课的教学实践加以具体阐述和分析。

## 二、清华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慕课的教学探索

“慕课”是近年来伴随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而迅速崛起的一个新鲜事物。与此前的网络或在线教育相比,它最根本的突破在于“一是实现了实时交互;二是可以采集和分析大规模数据”。<sup>[7]117</sup>慕课给全球传统的教育模式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有学者甚至认为它是“印刷术发明以来教育最大的革新”“大学的第三次革命”。在全球慕课方兴未艾的发展大潮中,清华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身先士卒,“以开放的、理性的态度,创新的勇气对待慕课”,“以此推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再上新台阶”<sup>[8]</sup>。

目前,作为清华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重要组

成部分之一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不仅已经超越了单一的线下传统课堂的讲授,而且在线上慕课教学的基础之上,成功进行了“线上+线下”双课堂混合式教学的有益尝试。2015年春季学期,清华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慕课先后在清华大学校内的SPOC平台和学堂在线平台上线,累计在线教学视频总时长约960分钟(16小时);至2017年底累计共有50所高校超过10万人选课,并被评为首批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自2016年春季学期开始,我们在清华大学校内进行了更为完整的混合式教学的尝试,即在线上完整的慕课教学之外,设置了8周线下专题课堂、若干次辅学讲座以及4次以学生发言展示为主的小班讨论。通过这种混合式教学模式,不仅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培养了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而且可以克服以往思想政治理论课传统课堂大班讲授课堂互动少、学生主题发言机会少的弊端,使思想政治理论课更为充分地发挥引领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历史观的作用。<sup>[9]</sup>

在清华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慕课制作筹备伊始,教学团队就确立了两条指导思想:第一,要牢牢把握思想政治性这个大方向。“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作为一门思想政治理论课,必须按照教育部的统一要求,尊重教材和教学大纲,内容上不能作天马行空的增删,主旨观点更要紧紧扣住中国人民历史上的“四个选择”,帮助大学生“认识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和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及其内在的规律性。了解国史、国情,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是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了改革开放”。<sup>[10]</sup>因此清华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慕课脚本以及整个框架结构和基本内容,都牢牢坚持这一大的方向,尊重教材和大纲。第二,要增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慕课的历史科学性。因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既是一门思想政治理论课,也是一门历史课;既然是一门历史课,就要充分地尊重并突出其历史科学性,尤其是要努力展现丰富生动的历史细节、建构清晰的时空脉络。在实践中,清华大学主要采取了两个手段来实现这一目标:一是借助“慕课”这个新教学载体信息量密集的独特优势,补充了大量的历史图

片、文献原文、动态历史地图、影视纪录片等等,让整个教学视频、教学过程更为丰满、充实;二是在每周正课的后面,增加了“师生问答(Q&A)”环节,通过主讲教师与学生对话这种相对轻松活泼的形式,回顾本周学习的重点、难点问题,同时也直面相关研究领域的热点、难点问题,突出强调历史研究的科学性和前沿性。

由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慕课初次摄制上线的2015年适逢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所以清华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有意识地适当强化了抗日战争史部分,“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这一章节的教学视频是所有13周课程中最长的,课后的Q&A环节也是所有课中最长的,涉及的讨论主题也是最多的。包括:(1)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原因,到底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在促成合作中起决定性作用?(2)中共是如何实行由“反蒋抗日”“逼蒋抗日”到“联蒋抗日”的转变的?(3)如何正确看待国民党在抗战中功绩与缺失?(4)如何全面看待抗战中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地位和作用?(5)如何看待台海两岸对于抗战的描述和评价之间存在的落差和分歧?

笔者仅以前两个问题的对谈为例。关于第二次国共合作,在确认中国共产党在推动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发挥了主要作用的基础上,我们也根据史料实事求是地对学生指出:共产国际,特别是1935年的共产国际七大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它直接推动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的历史性转变。在此之前,甚至到1935年6月华北事变发生之后,中共中央仍然是把反日与反蒋等同看待的;即便被认为是当时正确路线代表的毛泽东,也没能突破“反蒋抗日”的思路。由于德国法西斯遽然崛起的巨大危险,1935年7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七大“责成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参加共产国际的各国共产党进一步竭尽全力争取在本国和国际范围内建立统一战线”。参加共产国际七大的中共代表团的团长是王明,他在会议期间,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向国际社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也就是著名的《八一宣言》。《八一宣言》与以往明显不同的地方是,不再提打倒国民党政府和反对一切

帝国主义,而只是谴责汉奸卖国贼,它是推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重要文件,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开始,在这一重大问题上王明是有功的,我们不能因为王明此前和此后都犯过非常严重的错误,就否认这一点。在共产国际七大决议和《八一宣言》的指引下,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1935年12月,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并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这个决议基本上是按着《八一宣言》的思路,不再提打倒国民党政府,而是把斗争矛头集中指向日本帝国主义;但是毛泽东在会后第二天作了一个阐释决议精神的报告,其中仍然多次把蒋介石称为“卖国贼的总头子”“人民的死敌”,这种看法应该说还是有偏差的、不尽符合事实。而毛泽东自己在几个月之后也开始发现这种提法不大合适了。在这里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国民党、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反过来对中国共产党、对毛泽东也产生了影响。

红军到达陕北之后,对蒋介石集团的压力大减,但日本侵略的步步逼近,迫使作为中央政府领袖的蒋介石不得不寻找新的出路。本来蒋介石有一个一举两得的办法,就是重新取得苏联的支持——这一方面可以遏制日本,另一方面可以要求苏联出面说服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政府统一指挥下抗日,然而恰恰在此时,苏联方面对蒋介石的态度较为谨慎,进而使得蒋介石寻求苏联支持的努力收效不大。因此蒋介石只好转而主动寻求与中国共产党直接联系:一是让自己的亲信邓文仪访苏,接触在莫斯科的王明、潘汉年,并通过陈果夫、陈立夫兄弟联系周恩来;二是通过宋子文、宋庆龄最后联系到在瓦窑堡的中共中央。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抗日反蒋”的口号开始改变。1936年4月9日晚,毛泽东、彭德怀致电张闻天,提出:“目前不应发布讨蒋令,而应发布告人民书与通电”;“我们的旗帜是讨日令,在停止内战旗帜下实行一致抗日”;“中心口号在停止内战”。1936年5月5日,毛泽东、朱德联名向南京政府和各党派、各团体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通电中没有再提“讨蒋”“反蒋”的口号,以前习惯称“蒋贼”一类的字眼不见了,改为较为中性的“蒋

氏”。这一字之改象征意义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中国共产党显然已经放弃了“反蒋抗日”的方针,转而实行“逼蒋抗日”,这在全国社会各界产生巨大反响。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国共产党又由“逼蒋抗日”开始转向“联蒋抗日”,提出了著名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南京国民政府方面也开始作出积极的回应:停止了对红军的进攻,取消了对边区的经济封锁,给红军拨发饷金30万元。周恩来等先后赴西安、杭州、庐山等地同国民党代表进行谈判。等到“七七事变”全面抗战一爆发,两党的合作已经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了,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的称谓也由中性的“蒋氏”转变为“蒋公”“蒋委员长”这样的尊称了。<sup>[1125]</sup>

以客观实存的历史资料为依据,还原国共合作达成的历史细节,承认共产国际在其中所起的推动作用,同时也指出作为当时中国执政党的国民党在国难危机面前并非顽固不化、一成不变,他们甚至也有主动求合作的一面,这并不会动摇“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合作和抗日战争中起着中流砥柱作用”这样一个核心的结论,也不会从根本上折损毛泽东作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领袖的光辉——谁也不是天生正确、一贯正确的,毛泽东的思想发展也有一个不断演变、纠错的过程。尊重史料、还原细节、尊重历史,反而会使学生觉得这一段的历史更为丰富立体、真实可信。

### 三、结语:坚持历史科学性与政治性的统一

尊重历史,客观真实地还原历史事件和评价历史人物,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是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根本要求。历史作为过去发生了的事和客观存在的人,要遵循其物质第一性的原则,实事求是。在中国近现代史包括抗日战争史的教学及研究中,人物是重要的研究对象和线索。在这一方面,习近平说过:“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不能

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sup>[12]693</sup>所谓“大人物”,也要放在其对应的历史进程之中去考察,既不苛求古人,也要去伪存真,还要摒弃“英雄史观”,防止神化和以偏概全。这就要求教师在引导学生学习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研究方法的同时,尽可能多地丰富某一历史时间或历史人物的史料介绍,只有这样才能论从史出,增强研究过程和结论的科学性和说服力。

同时,在教学实践中,应该努力将历史、现实与未来紧密衔接在一起,防止教学研究陷于知识堆砌的尴尬境地,增强学生的课堂参与感和获得感。历史绝不是沉醉于故纸堆中的学问,也不是只关注过去的学问。“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就是旨在通过引领学生了解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进程,摸索历史的发展规律并进行归纳总结,以达到更好地指导实践、面向未来的目的。因此,我们在具体教育教学过程之中,还应该带领学生认清国家过往取得的成就、当前所处的历史方位和未来面临的挑战,并以历史上推动国家社会进步的仁人志士作为楷模激励学生砥砺奋进,以达到润物细无声的育人效果。

总之,无论抗日战争史部分的教学还是整个“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教学,都应当在牢牢把握思想政治性的大方向的前提下,努力增强历史科学性。缺乏历史科学性的依托,我们的教学与研究就难免流于思想政治理论的空洞说教。同样地,如果缺乏思想政治性的引导,我们的教学与研究便容易流于历史知识的简单堆砌。历史科学性与思想政治性之间不是对立的,而是应该而且能够统一的。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N].新华日报,2013-06-27.
- [2] 习近平致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N].人民日报,2015-08-24.
-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4] 沈湘平.回到整体的历史科学[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

- [5] 沈湘平.把握历史科学观念是正确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关键[J].河北学刊,2005,(2).
- [6] 王南湜.认真对待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概念——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特征的再理解[J].哲学研究,2010,(1).
- [7] 吴剑平,赵可,等.大学的革命——MOOC时代的高等教育[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
- [8] 艾四林.MOOC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创新[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 [9] 翁贺凯,李瓊珞.清华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慕课”混合式教学改革探索[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6,(12).
- [1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2018年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 [11] 王宪明,蔡乐苏.中国近现代史述要[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 [12]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责任编辑 吴宁宁]

\*\*\*\*\*

#### 勘 误

2018年第5期第2页目录中“史洪波”应为“史宏波”,“高校来华留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预防与危机干预策略研究”应为“高校来华留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预防与危机干预机制研究”,“严立宁 李昱颖 王鹤棋”应为“严立宁 王鹤棋 李昱颖”。

特此更正!

《思想教育研究》编辑部